答讯

(上接5版)

分别是欧阳棐等主张的开元十 二年(724)说、顾炎武等主张的 广德元年(763)说、钱大昕等主 张的大历三年(768)至大历六 年(771)说和朱关田等主张的 大历七年(772)十一月说。陈根 远研究员通过考察碑文中臧希 让的官衔和颜真卿的署衔,推 断《臧怀恪碑》写于大历四年 (769)六月至大历六年六月间。 此碑竖有列而横无行,行距、字 距均极为局促。陈根远研究员 推测,这一现象说明此碑经历 过曲折的刻立过程: 臧希让遣 人将其亡父臧怀恪的行状送至 抚州,嘱颜真卿为之撰书碑文, 同时告知碑石尺寸。颜真卿撰 文后将文稿传回京畿, 臧希让 审定、修改,再传回抚州。颜真 卿收到碑文定稿后, 让手下统 计字数, 然后将多张绢或纸拼 接成大小与碑石相当的整幅, 并按字数界格。颜真卿书写完 毕后把这幅"碑样"送到臧希让 手中, 但由于当初测量碑石时 出现失误,导致"碑样"的尺寸 大于碑石, 摹勒上石时只好删 除界格,变动行款,尽可能把所 有字压缩在碑石的尺寸之内。通 过这个例子,他指出,唐代丰碑 应是先书"碑样"于绢或纸,然后 摹勒上石, 唐碑上的界格很可 能正与绢写"碑样"有关。先写 "碑样"再行摹勒的刻碑程序甚 至不仅用于丰碑,墓志也有同 样的情况,陈根远研究员以《臧 怀亮墓志》为例进行了补充论 证。此志倒数第二行"特立功" 下脱"勋"字,而末行最后多出 一个"勋"字,他认为这一情形 的成因是,写"碑样"时漏写"勋" 字,在全文末尾补写,原计划让 刻工补刻干漏字之处,但由干沟 诵不畅, 墓勒上石时未及调整。 如果是在石上直接书丹,只需将 错漏之处擦去重写即可,不必在 文末补字。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 钩稽了颜真卿和韩择木的交 谊。韩择木精擅八分人尽皆知, 实际上他的楷书亦端秀精雅, 早年常用楷书为人书碑。肃宗 朝,他和颜真卿密切共事,情同 手足。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以 后, 韩择木写碑似乎再也不用 楷书了。陈根远研究员把这一 现象解读为韩择木对以楷书见 长的颜真卿的礼计,同时,他还 认为, 颜真卿任职抚州期间撰 写的《徐秀撰神道碑》和《慈恩 寺常住庄地碑》之所以均由韩 择木书丹,是因为颜真卿为了 报答韩择木的礼让,有意举荐 退休多年的故人。韩择木去世 后,颜真卿还请其长子韩秀实 合作书碑,深情厚谊可见一斑。

华人德教授对此做了精辟 点评。他指出,陈根远研究员对 《臧怀恪碑》的系年比过去的几

种说法更精确,不过,这篇文章 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对《臧 怀恪碑》制作过程的推测,虽然 只是推测,但对《臧怀亮墓志》 异刻现象的分析却能够为此提 供一个可靠的旁证, 说明唐代 有相当比例的碑版的书丹工序 并非直接在石面上进行的。华 教授补充说,在颜真卿的时代, 从他任职的地方到京城多走水 路,往返一趟就是两三个月,这 也就意味着他需要请很长时间 的事假。但是在当时,地方长官 不能长期缺任,否则会受到弹 劾。所以颜真卿不太可能直接 去臧希让那里书丹。由此看来, 《臧怀恪碑》确实是摹勒书碑的 一个具体的例子。过去启功先 生认为,摹勒上石始于元代,但 从《西亭记》《臧怀恪碑》《臧怀 亮墓志》这些个案来看,摹勒上 石的做法唐代就很流行了,其 实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推一 点,比如说高达4米的《升仙太 子碑》,武则天不可能趴在石面 上书丹。李明研究员说,他目验 过大量书丹于石的砖志, 但砖 志的形制和使用场合和丰碑不 太一样,能否等量齐观也是一 个问题。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 基金会林霄先生总结道,"书 丹"这个词到后来意思已经完 全变了,不再特指用朱砂写在 碑石上,仅仅表示书写"碑样"。

白谦慎教授引申出了一个 新的问题:明清时期有一个习惯,刻好墓志以后,把拓片送给亲友,唐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史睿研究员指出,唐代文献中记载过,碑版的书丹者会把碑拓送给亲友,甚至敬献给皇帝,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过有关拓拓拓大。其实唐代的传拓技术和像后世一样流行,抄写比拓印方便得多。陈根远研究员和华人德教授不约而同地谈到,唐代的纸张不仅非厚即硬,而且昂贵,不适用于传拓,敦煌出土的唐拓本也已经是晚唐的了。

延雨博士就绢写"碑样"提出了一个疑问:唐代的绢大多数是单丝绢,经纬之间比较松,把绢铺在几米高的丰碑上的时候,一拉扯字就很容易变形,这会不会给刻石造成困难?薛龙春教授回应说,真正的绢写"碑样"情况如何,在实物不存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一切推断只是基于文献记载。华人德教授认为,都说绢写,可能是因为唐代的绢尺幅比纸大,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当时有用纸来写"碑样"的情况。

冯培红教授指出了这项研究中的白壁微瑕之处,文中提到颜真卿和臧希让都曾担任御史大夫,因而有同僚之谊,但他们二人其实都只是"兼御史大夫",这个"兼"的意思是他们并非长期在御史台任职,只是带着这个头衔而已,这样的所谓御



颜真卿《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碑阴拓本

史大夫全国可能有上百个甚至 更多,所以说他们的交集可能 与历官无关。

上午场结束之前,白谦慎 教授代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 博物馆向湖州市博物馆赠送颜 真卿《西亭记》残碑拓片。

碑额是否为颜真卿 所写

下午场的研讨中,日本明治 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北京大学 史睿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李明研究员依次宣读了论文。

气贺泽保规教授的演讲题 目是《新发现颜真卿〈西亭记〉残 碑的解读及其历史意义》。在演 讲中,气贺泽教授发表了几个新 颖的观点。其一,碑文最后的"大 历一纪之首夏"只是书丹时间, 而非立碑之日,此外,正文结束 处的下方刻有疑似落款的文字, 当释为"大历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建之",亦为颜真卿所书。其 二,篆额也出自颜真卿之手。其 三,根据《西亭记》的叙述,李清是 当时一位重要的地方官,而且是 皇室人员,但却没有在正史中留 下痕迹, 这应当有更深层的原 因。由碑文中"清之筮仕也,两参 隽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赞 于蜀邑,子男于吴兴,多为廉使 盛府之所辟焉"一段可知:他就 官两次,一次在蜀邑,一次在吴 兴;"隽乂"即贤才,由此似乎又可 推测他曾在翰林院任职。其四. 颜真卿仕途亨通之时与李林甫 任宰相的时间重叠,他平步青云 有没有可能与李林甫有关?颜、 李关系密切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薛龙春教授对碑额书写者 问题提出疑问,他认为碑额不可 能是颜真卿所写,因为碑额里的 "西"是个错字,"畅"是个俗字,这 种错误不应该发生在出身文字 学世家的颜真卿笔下,另一方 面,唐碑里碑额和正文由同一个 人完成的情况也并不多。史睿研 究员补充说,颜真卿刺湖期间抄 写过《干禄字书》,这部书的序就 明确提到什么字可以用于碑版。

李明研究员对气贺泽教授 引述的一段碑文做了简要的疏 解,他指出,"再移仙尉之任"是 说他两次担任县官,而且很可 能是畿县或者望县的县官,"毗 赞于蜀邑"指他在今天四川某 个县当官,"子男于吴兴"就是 担任乌程县令,"多为廉使盛府 之所辟焉"发生在任职乌程之 前还是之后有待研究, 但至少 说明他曾经受某地节度使或监 察使之邀担任某个职务。就李 清正史无传、事迹湮没无闻这 一问题,华人德教授进一步解 释说,两唐书立传的具体标准 我们无法完全掌握,身份、地 位、事功与李清相当的人很多, 不少皇室宗亲也都没有立传, 毕竟两唐书的篇幅是有限的。 冯培红教授谈及, 他发现唐代 叫李清的人有很多, 其中有一 方墓志里提及的李清, 时代和 《西亭记》吻合,不过生平事迹 不明,无法确定是否同一人。

白谦慎教授认为,气贺泽教授对颜真卿和李林甫关系的推测有一定道理,大节上的刚正不阿和日常生活中的机巧其实并不矛盾。华人德教授说,李林甫虽然是个奸臣,但同时也是能臣,理财能力很强,如果颜真卿和他的关系比较好,大概不会是政治层面上的关联。

第二位演讲者是史睿研究员,他发言的题目是《颜真卿刺湖期间的诗文雅事与景观塑造》。他从颜真卿撰书《西亭记》人手,考证了颜真卿刺湖期间诗文碑铭涉及的湖州名胜与其家世、学问、交往之间的关联,

尤其关注颜真卿重新发现和修复、扩建前代名胜的系列活动,深入探讨了颜真卿塑造文化景观的过程、手法、意义,发掘了这些事迹背后的知识社会史问题。他特别指出,颜真卿的诗文在塑造景观的同时,实际上也通过宣扬柳恽、李清等良吏的事迹来强调循吏文化传统,他不仅仅是为了畅怀,更是为了教化民众、垂鉴后世。

冯培红教授认为,颜真卿为李清立碑除了强调汉代以来的循吏传统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复杂的政治意涵,比如说,他可能借助李清以及其他地方集团来对抗州僚,这背后的张力值得重视。

第三位演讲者是李明研究 员,题目是《颜真卿撰文的唐独 孤彦妻陈至墓志》。这篇文章先 介绍了陈至墓志的概况及其出 土环境,紧接着对颜真卿和陈氏、 独孤氏的关系进行了深细的考 述,得出如下几条关键信息。其 一. 颜真卿和陈至之父陈希烈曾 为同僚,颜氏以"相门才子,汉室 名卿"来称誉陈至之兄陈汭,可见 他和陈家关系密切。其二,志文称 陈至"善隶书,好属文",说明陈至 至少是一位善写楷书的书法爱好 者,很可能和颜真卿有过书法艺术 上的交流。其三,陈至的丈夫是唐 代宗独孤皇后的从父,这层关系恐 怕是颜真卿不避叛臣陈希烈之嫌 为陈家撰写墓志的原因之一。

白谦慎教授提出了疑问,独 孤皇后的面子在这件事中起了多 大作用?如果没有这层关系,颜真 卿是否还会撰写这方墓志?这个 问题实质上是说,像陈希烈这样 曾经投降叛军的重臣,颜真卿到 底怎么看待他们?当时对变节的 看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有没有 人统计过曾经接受过安禄山授官 的人在叛乱平息后都受到了什么 样的处罚?史睿研究员曾经对此 做过研究,他说,当时有一份很长 的处死名单,但是后来由于有王 缙、徐浩等人说情,大部分人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赦免。

颜真卿撰文或书丹的碑刻 既是伟大的艺术杰作,同时也是 珍贵的历史文献,围绕着文本解 读、书风剖析和史迹钩沉几个主 题,来自艺术史、考古、出土文献、 中古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与会 学者畅所欲言,工作坊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和坦诚、热烈的讨论 中渐渐落下帷幕。主办方和与会 学者均期望诵讨举办此次工作 坊,深化对《西亭记》残碑的认识, 同时也推动其他与颜真卿碑刻 有关的研究走向深入,引发来自 艺术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广 泛回应,从而推进人文学科各领 域的共同进步。据悉,本次工作 坊发表的成果将于明年初由浙 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 与考古学院)